

宜興文史資料

第四輯

宜兴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宜兴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三年四月



潘 汉 年 同 志 遗 像

目 录

- 一、潘汉年同志诗三首……………陈允豪辑录 (1)
- 二、潘汉年同志的青少年时代……………
……………潘可西口述 於太和补充 朱逸风整理 (2)
- 三、纪念潘汉年同志……………夏 衍 (4)
- 四、拨云见日慰英魂——悼念潘汉年同志……………
……………杨 帆 (15)
- 五、忠诚的革命战士 优秀的共产党员
——回忆潘汉年同志的几件事……刘人寿 (19)
- 六、悼念潘汉年同志……………王尧山 (25)
- 七、潘汉年同志在福建事变中的革命活动……………
……………薛宗耀 方长明 (34)
- 八、潘汉年夫妇最后的日子……………钟叔河 (38)
- 九、江苏省政协副主席陈立平同志逝世讣告……………
……………中共江苏省政协党组 (42)
- 十、陈立平同志传略……………田树凡 (45)
- 十一、深切悼念开辟太隔根据地的主要
领导者——陈立平同志……………储少白 (50)

- 十二、深切悼念陈立平同志……………俞志杰（ 55 ）
- 十三、怀念无产阶级优秀战士陈立平……………何 霖（ 60 ）
- 十四、生荣死哀的优秀党员 优秀干部
 陈立平同志……………杨洪才（ 67 ）
- 十五、回忆抗战前的“宜兴大公书报社”……………路光恩（ 74 ）
- 十六、抗日战争时期太湖地区工商税收概述……………
 ……………宜兴县税务局供稿（ 77 ）
- 十七、“宜兴女中”与杨嘉猷校长……………方 新（ 86 ）
- 十八、我县最早创办的一所女校——六年制
 的始齐小学……………黄绢才（ 90 ）
- 十九、我的老师邹韬奋……………葛怀诚（ 92 ）
- 二十、一生致力于教学事业的吕梅笙先生……………
 ……………钱凤绶（ 95 ）
- 二十一、回忆朱了洲校长……………储剑虹（ 99 ）
- 二十二、终生服务于体育教学的董志尧老师……………
 ……………储剑虹（ 106 ）
- 二十三、服务社会 奋斗终生
 ——忆葛沐春先生的事迹……………思 华（ 111 ）
- 二十四、宜兴水利（下）……………吕林生（ 118 ）
- 二十五、近代紫砂名艺人范大生……………李焕春 吴达如（ 124 ）

- 二十六、享誉世界的宜兴均陶…………李壮大 张震中 (127)
- 二十七、人制造神…………施雄度 (133)
- 二十八、岳飞三驻宜兴考略…………储建冰 蓼 汀 (136)
- 二十九、陈维崧与词学…………朱征骅 蒋才华 (141)
- 三十、古迹琐记…………晓 方 (146)
- (一) 海会寺
- (二) 芙蓉寺
- (三) 显亲寺
- 三十一、宜兴碑林 (上) ……………吴恩甲 (152)
- (一) 汉太尉许馼庙碑
- (二) 国山碑
- 三十二、惊奇广厦天生成——记灵谷洞…………於松生 (154)
- 三十三、洞天四宝…………韩其楼 (161)
- 三十四、十番锣鼓…………陆鹤云 张炳文 (164)
- 三十五、宜兴历代建制隶属情况简表…………蒋才华辑 (167)

潘汉年同志诗三首

陈允豪 辑录

两年前在整理新四军和苏皖抗日民主根据地资料时，抄录了潘汉年同志在淮南根据地所写《梦游玄武湖》、《探海东同志病》诗三首。原作发表于一九四三年八月十日油印的《拂晓报》上，具名汉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在党的十二大胜利召开的前夕，潘汉年同志二十余载的沉冤得到平反昭雪了，理应把他的诗公之于世。

梦游玄武湖

一九四二年九月

紫金山下看清秋，	鼙鼓声中访莫愁；
断壁残垣增怅惘，	丑奴未灭不堪游。
栖霞夜雨秣陵秋，	旧日山河故国愁；
遥拜中山魂欲断，	低头潜入白门游。

探海东同志病

一九四三年春

劲绿成阴曲径幽，	门前一湾小溪流；
沉疴不起经三载，	髀肉重生已白头。

潘汉年同志的青少年时代

潘可西口述 於太和补充 朱逸风整理

潘汉年同志出身于破落的书香门第，其父莘华(又名莘臣)是清光绪年间的秀才，耕读传家、以塾师为业。辛亥革命后，莘华被选为县议员，仍在乡间任教。汉年同志童年时随父就读，天资颖悟，秉性机灵，深得父辈喜爱。新学开始，他到宜兴县立第三高等小学读书。一年后又到和桥彭城中学学习。1920年暑假后，因腿部患病，辍学在家。那时他协助其父创办了陆平高等小学(原来只有初小)。他利用课余时间在学生中进行活动，定期出版黑板报，开辟一专栏《小研究》，张贴在揭示板上，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领域，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每星期六举行一次演讲会，都是由他发动和做好组织准备工作的。为了开展课外阅读活动，他利用荆西社(潘梓年、潘菽等同志创办)原有的书籍，又补充了一部份少年读物，给同学们灌输新思想、新知识。

1921年，汉年同志到武进延陵公学学习。他爱好文学、戏剧，善于表演穷苦人民的形象，一举一动，颇为逼真。他又喜学外语，易于接受新事物、新思想。1922年，他到宜城励进社小学任教，对当时教育界的现状表示强烈不满。他就团结当地的进步青年和“宜兴评论社”的一些同志，反对教育局长周某重用“四凶”(宜兴有四个土绅横行霸道，称为“四凶”)把持教育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因此他被关押起来，后来其父聘请上海的律师为他辩护，才得释放。周某在舆论的压力下被免职。

1924年，汉年同志又到和桥养初小学任教。1925年，他到上海唐文治创办的国学专修学校学习。不久，他到中华书局编辑部工作，开始进行文化活动。随后，他参加共产党，加入郭沫若、成仿吾组织的“创造社”，在出版部工作，主编《A11》（是当时“创造社”门牌的编号）周刊。该刊出至五期停刊。他又主编《幻洲》周刊。这是一本小型杂志，分上、下两部，上部刊登文艺作品；下部刊登评论、杂文等，当时他常用的笔名有建行、汗牛、水番三朗、广人等。他发表了《幻想中的OAZO》、《青鸟馆》、《苦哇鸟》等文。

1926年，汉年同志和郭沫若同志一起参加北伐战争。他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兼《革命军日报》总编辑。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仍回上海，参加左翼文艺运动。

读夏衍《纪念潘汉年同志》

朱 怀 真

犹忆风云突变初，	英雄面目闹糊涂。
可怜身后终纠错，	泉下冤魂解笑无？
桑梓革命称前辈，	何意令名化作灰？
故旧株连曾目睹，	小街愁听汽车来。
一心为党事昭然，	空口忍能定内奸！
自有文章引铁证，	长将愚昧笑当年。

纪念潘汉年同志

夏 衍

二十七年的沉冤，终于平反昭雪了！这是值得我们引为鉴戒的历史教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所谓“潘汉年案件”在没有家属提出申诉的情况下，经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历时一年五个月的认真复审，详细研究了原始资料，核对了中央档案馆和有关部门的历史记载、来往电报和大量的人证物证，得出的结果表明：原来认定潘汉年同志是“内奸”的结论，完全是诬陷不实之词。党中央于今年9月1日，也正是伟大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日子发出通知，正式为潘汉年同志恢复名誉。这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方针的胜利。这一决定再一次证明，我们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

潘汉年同志，江苏宜兴人，生于1906年，青少年时期就受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1923年参加进步文艺运动，1924年加入郭沫若、成仿吾等同志领导的“创造社”，同年主编《洪水》等进步刊物，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在南昌、武汉等地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回到上海，参加了“创造社”同人编辑的文艺杂志《A11》^①和主编了《幻洲》。1928年，他调到党中央宣传部，负责文化、出版、文艺界的联络统战工作。

1924年，他在创造社出版部工作时期我认识了他，但在二十

年代后期，尽管我知道他在上海工作，却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上了年纪的人都会知道，1927年到1929年冬，上海进步文艺界之间发生过一场剧烈的论战。不少现代文学史研究家都简单地把这场论战说成是创造社、太阳社同鲁迅先生及文学研究会之间的论争，其实，这之间也还有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论争，以及创造社的内部分裂。当时，我们党还在幼年时期，这场文艺论争开始的时候，正是工农红军在闽赣粤一带战事紧张的时候，也正是中央同“陈托取消派”斗争最剧烈的时刻，因此，文艺问题还排不上党的主要议事日程。所以在我记忆中，这场论争开始的时候，党没有进行干预和加强领导。直到1929年夏秋之交，在上海闸北区的一次支部会上，洪灵菲才告诉我们，说党中央已经决定，要党员作家和党外革命作家停止论争，“共同对敌”。这样，在中宣部的领导下，潘汉年同志写了第一篇缓和这场论争的文章。这就是1929年10月15日发表在《现代小说》三卷一期上的《文艺通信》。正和这之后一大段时期一样，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革命文艺家应该写哪些题材，一直是一个争议不休的问题，因此潘汉年同志在这篇文章中写了下面这一段话：

“与其把我们没有经验的生活来做普罗文学的题材，何如凭各自所身受与熟悉一切的事物来做题材呢？至于是不是普罗文学，不应当狭隘的只认定是否以普罗生活为题材而决定，应当就各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还引用了李初梨同志发表在《创造月刊》二卷六期上的《普罗列搭利亚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的几句话来作结语，初梨的文章也是一个明显的转变：“……普罗列搭利亚文学的作家，应该把一切社会的生活现象，拉来

放在他的批判的俎上，他不仅应该写工人农人，同时亦应该写资本家，小市民，地主豪绅。”

与此同时，潘汉年同志代表中宣部召开了一个包括创造社、太阳社、冯雪峰、我以及党外的郑伯奇同志等在内的座谈会，这是1929年10月中旬在北四川路的一家咖啡馆楼上召开的。潘汉年主持会议，传达了中央对这场论争的意见，认为主要的错误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要求立即停止对鲁迅和茅盾的批评（茅盾当时还在日本，但创造社、太阳社对他的《从牯岭到东京》也批评得很厉害），同时还对自己的没有及时发现问题，作了自我批评。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推定了包括鲁迅、郑伯奇在内的十二个人，作为“左联”的筹备工作人员。当郑伯奇问“鲁迅会不会同意参加”时，汉年同志说，中央已经有人和他谈过，他同意参加并赞同“左翼作家联盟”这个名字。这个十二个人的筹备会，每周召开一次，都由潘汉年同志主持。筹备会的任务是起草一个“左联”纲领，并分头征集会员，和拟出一个发起人名单。1980年3月，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举行“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不少同志写了纪念和回忆文章，但是由于“潘汉年案件”正在开始复查，所以大部分文章都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我还看到过一篇文章，说领导筹备“左联”工作的是闸北区街道支部，这是不符事实的。从1929年9月起，散在闸北区各街道支部的文艺工作者的大部分人都已集中到“左联”筹备小组，而这个小组，从开始到“左联”、“社联”、“剧联”成立，一直是潘汉年同志领导的。他是党中央直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第一任书记，这一点，现今还健在的王学文、李一氓、李初梨、阳翰笙、冯乃超等同志都会记得很清楚的。

从1929年秋到1931年夏，上海白色恐怖极端严重，汉年同志在这个情况下出生入死，写了不少文章（如1930年2月10日发表在《拓荒者》一卷二期上的《普罗文学运动与自我批判》等），做了大量工作，如支持郑伯奇、冯乃超、沈叶沉等组织了“上海艺术剧社”，出版了许多进步杂志。由于他的机智精干，受到领导上的重视，从1930年起，他还担负了“保卫自由反帝大同盟”和国际互济会等方面的工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过，所以他有許多当时的上层社会关系。有一次他去找杨杏佛，我问他什么时候认识的，他笑着说：“老交情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前夕准备召开的上海市民大会，十五名主席团中，就有他的名字。”

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他在当时“文总”的机关（南京路王兴记木器店楼上）向“文委”所属各联的党员作了全会决议的传达报告。这之后，冯雪峰同志接替了他的“文委”书记职务。我有半年多没有和他见面。大约在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我，会面之后，他就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开到法租界的薛华立路的一家小洋房里，把我介绍给一位五十出头一点的绅士。他们似乎很熟脱，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客套。汉年同志一上来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很难说，所以……”他指着我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补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他们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的人的名字我全不了解。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他，潘收下后连谢谢这句也不说，我也猜到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了。出了门，他才告诉我：“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

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停了一会，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里来避难。”这之后，我和潘汉年同志阔别了五年，直到抗战前夕才再次会面。他给我介绍的那位老先生，开头我连他姓什么也不知道，大约来往了半年之后，他才坦然地告诉我：“我叫杨哲子，杨度。”这一下可真的使我大吃一惊。关于这件事，1978年8月我写了一篇《杨度同志二三事》（见1978年9月6日《人民日报》副刊），其中有几句话：“到上海后，他（杨）加入了‘中国互济会’捐助了一笔可观的经费。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经人介绍，他申请入党，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经人介绍”的这个人，就是潘汉年，我当时不便写。

二十年代他在创造社时，干的是掘书籍、跑印刷厂、邮政局之类的事务性工作，大家叫他“小伙计”。到三十年代，他已经可以和杨杏佛、杨度这样的名人打交道了，不知哪一个人给他取了一个代号叫“小开”。“小开”上海话是小老板的意思。

这之后他到了中央苏区，先后任江西苏区党的中央局宣传部长，赣南省委宣传部长。1934年他作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的代表，去福建和蔡廷锴、蒋光鼐领导的十九路军谈判，签订了停战抗日协定。1934年底他参加了长征，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遵义会议后，为了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情况，中央派他和另一位领导同志化装经上海、海参崴去苏联。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之后，中共中央和红军发表了《八一宣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又派他回国，到南京和国民党谈判停止内战，合作抗日。整个谈判中，他坚持原则，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利益与尊严，谈判未成，他回返延安。1936年“西安

事变”后，再次由党中央任命他为中共正式谈判代表，到南京和国民党谈判第二次国共合作问题。我再一次遇见他，正是“七七”和“八一三”之间的1937年7月中旬。这时，文艺界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已成尾声，但是，由于1931年到1935年中的白色恐怖严重，特别是李竹声、盛忠亮的叛变，上海和大江南北的党组织遭到了连续不断的破坏，以致中央机关、电台、工会、共青团、文委（包括各联盟）等等保存下来而在抗日救亡高潮中分散作战的党员，由于他的到来，才得到联系和团结。他熟悉上海敌我友三方的情况和各方面的人事关系，经他和李克农同志建议，经周恩来同志批准，一方面可以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党员与必须长期隐蔽的地下组织严格分开，另一方面，利用第二次国共合作才开始的时机，和“救国会”、“各界救亡协会”等爱国团体以及国民党人合作，放手组织公开合法的救亡队伍（如“战地服务队”、“救亡演剧队”）转入内地和前线工作。同时，把经过长期谈判才获得释放的“政治犯”安排工作或送往延安。大约是1937年9月下旬，潘汉年被任命为第十八集团军驻沪办事处主任。他就运用这个身份应陈诚、张发奎、罗卓英^②的要求，把由革命青年组成的三个战地服务队派进国民党的军队，担任宣传、组织、救护工作。这时，郭沫若同志已经由日本秘密回到上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决定出一张小报，国民党政府却迟迟不予批准。最后，还是汉年同志和郭老直接和潘公展会谈，勉勉强强决定了国共双方各出开办费500元，出版了以郭沫若为社长的“上海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这一段时期，他在上海耽了不到五个月（他是在上海沦陷后，于12月下旬和我同船到香港的）。他在这时期做了大量工作，真可以说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同时，他还和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沙千里等爱国民主

人士建立了亲密真诚的“心心相印”的关系（“我们和你们之间是心心相印的关系”这句话，是沈钧儒先生代表“七君子”向潘汉年、刘少文^③同志说的）。

抗日战争时期他除了两次回延安（其中一次是1945年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外，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香港等地进行对敌的隐蔽斗争和开展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统战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他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取得了日伪军事动向的重要战略情报。由于他在1930年就建立了一条从上海到淮南、苏北解放区的地下交通线，因此在“皖南事变”以及历次环境恶化的时刻，保证了上海和解放区的人员和物资的交通（邹韬奋同志病危的时候，就是经过这条交通线送到上海就医的）。

特别使我难忘的是1948年以后，解放战争迅猛发展，蒋家王朝即将覆灭的那两年时间，时局瞬息万变，工作十分紧张，正在这个时候，民盟、民革、民进……等民主党派都要在香港召开代表大会；刘长胜、刘守一等同志要在香港培训工会干部；东北解放区领导机关不断派人和来电要在港澳和海外聘请内外科医生；更重要的是，为了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工商业家、文化界人士，都要从西南、西北、华中、上海等地转到香港，再由我们租船把他们送往青岛、大沽、大连，然后到河北省平山集合。单就护送民主人士去华北这一件事，历时一年多（从1948年到1949年3月）。据不完全估计，路经香港坐船到解放区的知名人士——如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叶圣陶，还有许多作家、演员，一位起义的国民党军长、一位西北军的代表，最少也有三百五十人以上。当时东北和华北一部分已经解放，所以我们可以租用外籍轮船开往东北，运出大豆、人参、

药材、土产……在港澳市场卖出，然后买进解放区急需的西药、纸张、五金运回东北，也就趁此机会，让民主人士搭船北上。据我回忆，开始几次，国民党特务和港英当局似乎没有察觉，但是不久，当他们嗅到风声之后，就警戒森严，多方阻挠。这件事，用现在的话说，完全是由汉年同志“牵头”的，事无巨细，从要到华北去参加新政协的人士们从内地到香港起，欢迎、宴请、商谈、帮助他们安顿家务，一直到妥善地送他们上船为止，他无时无刻不为这些事操心。当时，方方、尹林平同志已经回到东江根据地，章汉夫已经调往刚解放的天津工作，剩下来的除了许涤新、饶彰风、乔冠华和我之外，连平时搞文艺、跑新闻、管经济的同志，也调来当旅馆经理、码头接送人员和勤杂人员了。特别是一张小报透露了李济深先生即将北上的消息之后形势就格外紧张了。那个时候，五角大楼和唐宁街的决策人物，始终抱着一个“划江而治”的幻想，加上当时在南京当权的桂系集团也还在徘徊不定，因此，他们认为把李济深先生扣住在香港，还不失为一个重要的筹码。尽管那时已下了决心，用闭门谢客的形式来麻痹他们，但是李先生如何才能出走，倒真地成了汉年同志伤脑筋的问题。他办事稳，抓得细。租哪一家公司的船？船长、大副、二副对我们的态度如何？这一条船上有哪些人同行？有几个人认识李任公？人们带的行李有多少，万一要检查时会出什么问题？等等，他都缜密地考虑。在他确定了最保险的方案之后，再商定实际陪李先生出门、住旅馆、搬行李、乃至保卫、放风、随时向他报告消息的人选。他、饶彰风和我三个人在一家旅馆守着一架电话机听消息，直到听到“船开了，货放在大副房间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这个谜语一般的电话，才松了一口气。计划完全成功，李先生走了三天之后，报上才见消息，而这时他已经过了台湾